

加了帝国协调内战、外交、经济、军事的复杂性，加大了腐化、发展失速和体制僵化的概率。复杂的民族关系平衡牵制着苏联的经济模式、外交战略和军事布局。苏联开创了传统帝国应对民族主义的新模式，但在现代国家建设的综合能力上弱势显著，这是其驾驭民族主义不能完全得心应手的最主要原因。

【论 文】

美国福音民族主义的形成及发展趋势¹

周少青²

摘要：福音民族主义是美国国家（民族）主义在 21 世纪的新表现。其对内主张国家认同与基督教信仰相融合，宣称“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对外奉行“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福音派早期的宗教、政治及社会活动集中反映在所谓“大觉醒”的宗教复兴运动上。20 世纪 70-80 年代兴起的道德多数派是福音民族主义的一种重要的演练或尝试。2016 年特朗普当选总统，标志着美国福音派等保守主义由一种宗教保守力量，发展成完整形态的民族主义。应对美国内外部条件巨变、传统保守主义策略调整、白人种族主义的复兴、公民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的互搏以及美国现代性危机是福音民族主义崛起的重要条件或历史背景。随着美国面临的内外矛盾的相对缓和及保守主义策略的相应调整，特别是随着公民民族主义阵营力量的增强，福音民族主义的动能将进一步减弱，但是另一方面，从“认同与终极信仰”的视角来看，尽管随着美国内外部条件的舒缓，以“文化战争”为表征的认同问题会相对纾解，但作为一个以基督教文化与信仰支撑的“基督教国家”，福音民族主义的韧性仍将十足。福音民族主义将继续在美国内政和外交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福音派；福音民族主义；国家认同；公民民族主义；族裔民族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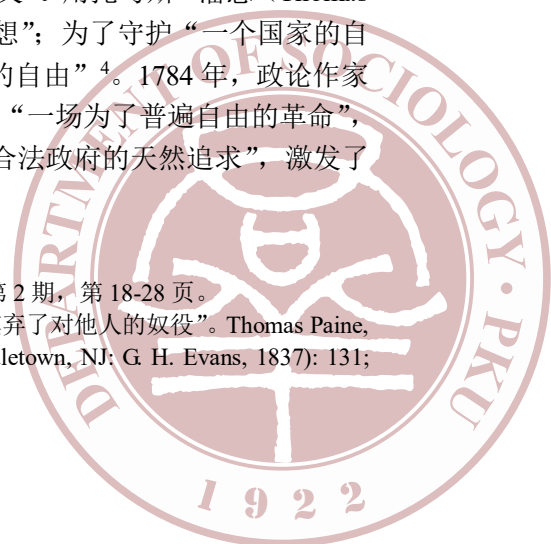
民族主义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大体说来，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发展大致经历了教派（天主教、基督新教 [Protestanism, 下称“基督教”]）民族主义、族裔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三个阶段³。作为“例外论”的典型国家，美国的民族主义显示出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独特发展路径。众所周知，美国的创建始于英国在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之间的联合。但是推动它们联合起来发动独立战争并最终创立美国的力量，并不是推动西欧民族国家构建的那种民族主义力量。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建也不是为了追求类似西欧民族国家的基于族裔、语言、文化或宗教身份认同一致性的民族主义目标；相反，它的目标是“自由主义”和“普世主义”。用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话来说，独立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捍卫“自由”的“理想”；为了守护“一个国家的自由”，潘恩甚至断言“没有美利坚，就没有整个世界（Universe）的自由”⁴。1784 年，政论作家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牧师大力颂扬美国革命，称之为“一场为了普遍自由的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传播了“对人类权利的正当情感和对合法政府的天然追求”，激发了

¹ 本文刊载于《二十一世纪》2021 年 12 月号，总第 188 期，第 38-55 页。

²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³ 参见周少青：“论两个共同体理念的世界意义”，《西北民族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18-28 页。

⁴ 潘恩还声称，美利坚人所捍卫的自由远胜过古希腊罗马的自由，因为她“摒弃了对他人的奴役”。Thomas Paine, “The Crisis, No. V”, in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Vol 1, (Middletown, NJ: G. H. Evans, 1837): 131; 149.



反抗暴政的精神，为世界各地的被压迫者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为创建一个可作为“自由、科学和美德的基地”的国家（empire）奠定了基础。¹

既然美国革命是一场“反对暴政”、“为了普遍自由”的革命，那它就不能是任何种族或族裔、语言、文化或宗教意义上的民族主义革命。事实上，为了反抗压迫，争取独立和自由，北美十三殖民地人民与有着近乎相同身份认同的英国白人殊死较量。不仅如此，为了确保斗争的胜利，这些扎根北美的英国殖民者还不惜与“母国”的宿敌法国结盟。

由于美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使得美国从一开始就与西欧经典民族国家以及其他后发民族国家所追求的民族主义截然不同。西欧民族国家的精英奉行“一族一国”、“以族划界”理念，他们或以“想象的民族”，或以“实然的民族”，或以“半想象、半实然”的民族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在此过程中，培育出一种高烈度的身份政治——民族主义²。而那些后发的民族国家则程度不同地接过了经典民族国家（同时也是殖民者）手中的民族主义火炬，并结合自己的国情将其煅烧得更加炽热。³

相形之下，创立美利坚合众国的力量或理念，很难说是民族主义的。从其后来发展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来看，推动美国大规模扩张和进行外部干预的力量或理念也不是民族主义的（至少不是西欧国家那样的民族主义）。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根植于深处的清教主义基因⁴，美国“无差别的自由主义和普世主义”面纱背后始终半隐半现地萦绕着“基督教民族主义”⁵的影子。尤其在美国家处于重大的政治或社会转型之际，往往被无差别的“自由民族主义”或“公民民族主义”所遮蔽。在国家处于重大的政治或社会转型之际，或者在遭遇严重的社会危机或挫折的情况下，则会展现出一种特殊的“宗教民族主义”或“族裔民族主义”。

进入 21 世纪，在内外种种危机的夹击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 1960 年代以来相对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民族主义或公民民族主义，受到美式基督教民族主义——“福音民族主义”的严峻挑战。本文所谓“福音民族主义”，指谓与传统自由民族主义或公民民族主义相对立的、保守的宗教与政治民族主义，它以福音派为主干和标识，杂糅了各类右翼、宗教右翼（包括所谓新、老右翼）甚至“另类右翼”，特别是聚合了多种力量而成的（新）保守主义——事实上，正是由于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或者说与民族主义的合流，才促使以往以改造社会、影响国家政治议程为目的的宗教福音主义，开始全面转向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的，继而以福音基督教的价值理念型塑政府和社会的国家民族主义——福音民族主义。需要强调的是，“福音民族主义”这一提法，并不意味着所有福音新教徒都是福音民族主义的支持者或成员。事实上，有不少福音派新教徒是自由主义者。也有不少非基督教徒是福音民族主义的坚定支持者。

福音民族主义对内主张美国国家认同与基督教信仰相融合，宣称“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对外奉行“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福音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美国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首先介绍福音派的基本教义及早期政治和社会运动，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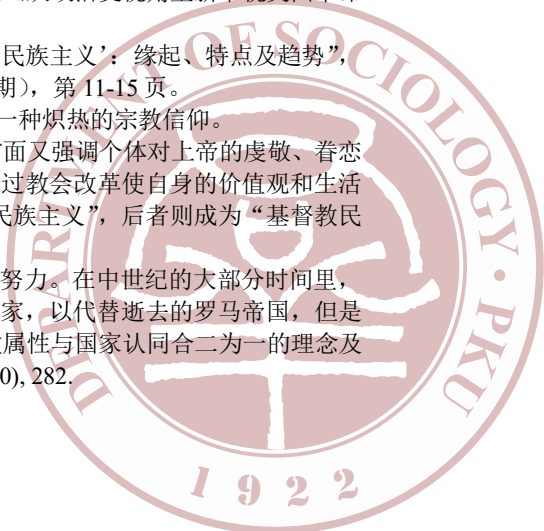
¹ Richard Price, *Observation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Means of Making it a Benefit to the World* (Boston: Re-printed by Powars and Willis, 1784), 3-5, 转引自李剑鸣：〈从政治史视角重新审视美国革命的意义〉，《史学集刊》，2017 年第 6 期，第 15 页。

² 有关民族主义是一种高烈度的身份政治的论述，参见周少青：“21 世纪‘新民族主义’：缘起、特点及趋势”，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内部资料，2020 年第 6 期），第 11-15 页。

³ 例如在印度，（印度教）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而且也是一种炽热的宗教信仰。

⁴ 清教主义是美国形成的基因密码，一方面坚持个人自由、宗教自由，另一方面又强调个体对上帝的虔敬、眷恋和精神依附以及道德上的自律，清教徒自视为“上帝的选民”，他们试图通过教会改革使自身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影响整个国家。前者最终孕育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或所谓“公民民族主义”，后者则成为“基督教民族主义”或本文将要讨论的“福音民族主义”的酵素。

⁵ 所谓“基督教民族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试图建立泛基督教国家的努力。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欧那片土地上的人们都试图组建一个能够囊括所有基督徒的宗教-世俗国家，以代替逝去的罗马帝国，但是都没有成功。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后，基督教民族主义是指那种试图将基督教属性与国家认同合二为一的理念及行为。参见 Louis L. Snyder, *Encyclopedia of Nationalism* (St. James Press, 1990), 282.



其侧重于共和、传统、保守尤其是“基督教特性”的一面，为福音民族主义提供了重要的价值观支撑；接着提出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兴起的“道德多数派”及其政治实践是福音民族主义的一个初步演练；然后论述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Donald J. Trump）的当选，标志着福音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最后在分析了福音民族主义崛起的条件和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对其发展趋势做出研判。

一、基督教福音派的早期政治及社会活动

（一）福音派的意涵及其主要教义

“福音派”（evangelical）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福音”（gospel），意为“好消息”、“可喜的讯息”等。历史学家认为，宗教改革中的领导人威廉·廷德尔（William Tyndale）是第一个使用英文“福音派”词汇的人。著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是第一个使用拉丁化“福音派”（evangelium）词汇来描述从天主教中分离出去的新教教会群体。福音派正式形成于 18 世纪。根据宗教史学家凯瑟琳·布兰克丝（Catherine Brekus）的研究，福音派是 18 世纪基督徒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信仰形式。但是在此之前，宗教改革者就已经用“福音主义”来描述他们的信仰了¹。18 世纪福音基督徒的三个基本特征是：强调个人与上帝的直接沟通、重生以及主张在全世界传播上帝的福音。在此期间，涌现出许多致力于福音运动的神学家和布道者。

19 世纪晚期至 20 世纪早期，美国的绝大部分基督徒都可以归类为福音派教徒。后来围绕《圣经》真理性等问题，新教徒出现了严重分化，那些更倾向于自由主义或现代主义的基督徒形成主流派，保守派则被划归基要派，而基要派中的大部分人都被认为是福音派教徒²。二战期间及战后，福音派的组织化程度渐次加强。基督教青年归主协会（Youth for Christ）和全美福音派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就是这一时期成立的。

从教义上看，福音派有五个基本特点，一是主张基督徒必须经过“悔悟”、“悔改”而获得“重生”或“新生”；二是确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基督徒最高的权威；三是重视耶稣被钉十字架及其拯救效果；四是坚持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福音；五是普遍相信“世界末日”一说。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福音派有着相对清晰的发展脉络、组织系统和明确的教义，但是在实践中区分“谁是福音派教徒”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宗教历史学家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曾经打趣说，在 1950 至 60 年代，福音派基督徒是“任何喜欢葛培理的人”。但是当已故著名福音派领袖葛培理（William F. Graham）牧师在 1980 年代后期被要求定义“福音派”这个词时却回答说：“实际上我也想问别人这个问题”。对民意调查者来说，福音派是一个社会学术语；对牧师来说，福音派是一个教派或教义学术语；对于政治家来说，它是“白人基督教共和党”（white Christian Republican）的同义词³。现实中，有人认为凡是保守的基督徒都属于福音派；也有人认为福音派教徒并不都是基要派，因为它注重学术研究、强调各宗派的合作以及社会关怀和社会责任。还有人认为，不能称天主教徒为福音派，理由是福音派是基督徒的专用词汇，基督教起源于与天主教的分歧；此外，还因为天主教虽然接受《圣经》的权威，但也赋予教会和教宗相应的权威，等等。在“谁是福音派教徒”这一问题上，美国社会的分歧颇大。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界定“福音派”的标准五花八门。从最宽泛的“只要承认自己是重生基督徒”到比较严格的须同时满足福音派教徒界定的标准，反映了美国宗教保守群体内部的光谱色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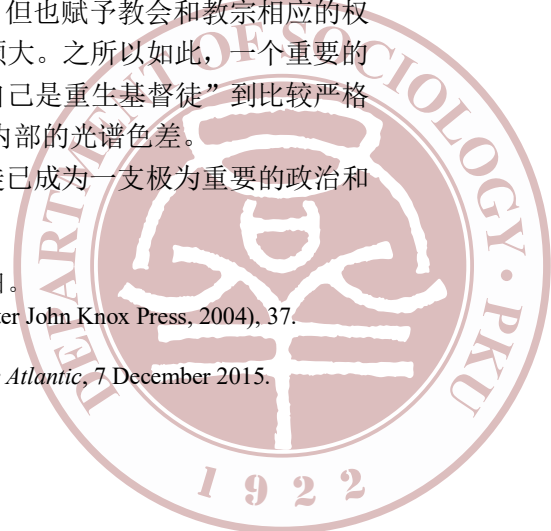
目前福音派大约占美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⁴。在福音派基督徒已成为一支极为重要的政治和

¹ 周少青，“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历史轮回”《周评天下事》2019 年 9 月 30 日。

² Roger E. Olson, *The Westminster Handbook to Evangelical Theolog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4), 37.

³ Jonathan Merritt, “Defining Evangelical”, *The Atlantic*, 7 December 2015.

⁴ 争议数从 7%至 47%不等，参见 Jonathan Merritt, “Defining Evangelical”, *The Atlantic*, 7 December 2015.



社会力量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界定“谁是福音派教徒”已成为影响美国大选、社会舆论以及公共政策选择的一件大事。限于篇幅，本文无意加入界定“福音派”的行列。但是必须指出，所谓“福音派”并不是一个有明确指向的教派。在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派别中都存在着福音派，其中改革宗、浸信会、卫理公会、五旬节派及灵恩派中的福音派尤多。历史上，福音派曾是“基督教复兴主义”（Evangelical Revival）的同义词，现实中，福音派有时意指宗教保守群体或宗教右翼，有时泛指基督教中的主流派，由此可见福音派的历史和现实影响之大。

总之，福音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宗教、社会和政治现象。它首先是宗教改革的重要产物。数百年来，福音派在反对天主教的体制化及其对个人自由的压迫或限制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面对世俗主义潮流的强大冲击，福音派在组织化程度、维护传统婚姻家庭、反堕胎、抑制同性恋群体的权利，特别是在捍卫所谓“宗教自由”方面与天主教的差距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与天主教合流的趋势（也出现了“福音派天主教徒”这样的称谓）。这一方面表明，“基督教的美国”始终存在着一种强大的自我维系的内生力；另一方面也说明，美国国内始终存在着基督教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或自由民族主义两种势力的争斗——而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态的相对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平衡——在其他变量恒定的情况下，每当公民民族主义或自由民族主义过度伸展时，基督教民族主义就会活跃起来并以某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介入政治和社会生活。

21世纪以来，美国国内政治明显过度“自由化”，在民主党连续多年的执政过程中，女性自由堕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以及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导致宗教保守群体尤其是福音派基督徒的强烈不满，再加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白人群体经济社会地位的下滑，以及大国干预或入侵导致的难民潮及恐怖主义等，最终导致有着重要社会和政治影响的福音派教徒走向历史前台，并与急于寻找新的转机的传统保守主义政党共和党合流，形成影响深远的福音民族主义。

（二）福音派的早期宗教、政治及社会活动

福音派早期的宗教、政治及社会活动集中反映在所谓“大觉醒”的宗教复兴运动上。按照美国历史学家的观点，历史上一共经历了四次所谓“大觉醒”，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美国的政治及社会发展走向，而引领大觉醒的力量正是福音派基督徒。

第一大觉醒发生在18世纪30至40年代，是欧洲大陆虔敬主义和英格兰福音派运动的一部分，也是欧洲宗教改革的继续。面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体制化教会严苛的形式主义威胁，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等保守（福音）派领袖积极奔走于各个殖民地，富有激情地提出和论证了许多影响美国政治和文化的神学论断。他们强调人类的“原罪”，认为只有向神认罪，寻求赦免，接受神的恩典，才能得到拯救；并强调所有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建立联系，认为宗教不应该是体制化或制度化的，而应该是个体化和随意的。爱德华兹等人“复兴”基督教的运动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强调个体与上帝的直接沟通，使得大量可能被视为“异端”的教派合法化，客观上扩大了宗教自由，提升了宗教宽容（殖民地也因此吸引了大批欧洲的受宗教迫害者），也促进了殖民地民众的平等意识；教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了北美的民主化进程；同时，大觉醒在思想上、政治上强化了北美十三殖民地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尽管由此所产生的争论导致殖民地基督教各派分裂为支持复兴运动的“新光”（new light）和反对复兴运动的“老光”（old light）两派，但作为各个殖民地第一次所共同经历的重大事件，大觉醒客观上为十三殖民地的联合、继而走向独立建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亨廷顿在谈到大觉醒对美国革命影响时引用了哈佛大学学者艾伦·海默特（Alan Heimert）的话：“福音动力是热烈的美利坚民族主义的化身和工具。在革命前美利坚的福音教会中，铸就了日后体现美国早期民主制思想的各个论坛和民众的大联合”，当时美利坚将近人口一半的公理会、长老会和浸礼会的广大教友“接受了千禧年思想”，而“这些千禧年教派正是美国革命的最坚定支持者”



1。

值得注意的是，推动这场大觉醒的最初动机并不是为了促进殖民地人民的团结或联合，更不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近代民族国家；相反，它一方面是为了应对欧洲启蒙思想漂洋过海带来的科学、理性及逻辑精神对宗教的冲击；另一方面，是为了纠正宗教过度体制化所引起的教堂出席率低等问题。但是从结果上看，大觉醒唤醒的不仅仅是殖民地人民的宗教虔诚之心，提振的也不仅仅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在参与宗教复兴的过程中，殖民地人民的自主、平等意识以及公共事务参与、公共道德重建的信心得到极大锻炼，美利坚人的整体意识也得到很大提升²。不仅如此，大觉醒还使得殖民地人民形成了一种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及政治事务的习惯。

后来，美国社会又于19世纪20至30年代、90年代以及20世纪50至60年代经历了第二至第四次大觉醒。第二次大觉醒的主要议程是废奴运动，这场被誉为“美国第二次革命”的“福音传道和奋进主义运动”最终动员起千百万民众参加轰轰烈烈的解放黑奴事业。第三次大觉醒则直接与争取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平民主义和进步党主义运动相联系，主张反托拉斯措施、妇女选举权、公民立法提案权、公民复决投票权、罢免权、禁酒、铁路管制和直接初选。第四次大觉醒又与美国的两次政治改革运动密切联系：第一次是结束法律上和体制上对黑人的歧视和隔离，第二次是20世纪80至90年代的保守派改革运动。³

纵观福音派四次大觉醒运动所推动的政治、宗教、社会议题，我们发现，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福音派几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社会议题上都存在着两面性：第一次大觉醒一面追求宗教虔敬，另一面却在不经意间锻造出世俗的“美利坚意识”。从追求宗教虔敬的维度来看，一面强调人的原罪及只有通过上帝的恩赐才能获得救赎，另一面则强调个人与上帝直接沟通及人的平等性。第二次大觉醒一面“追随上帝”废除奴隶制，另一面却以上帝的名义维护奴隶制（战争中南北兵士都高唱“上帝降临光荣”，都认为自己是在为“上帝”的事业而战）。第三次大觉醒一面追求平民主义及进步主义的平等理念。另一面却普遍相信在美国出生的白人的优越性、基督教尤其是清教徒道德的优越性。第四次大觉醒一面谴责政治和体制上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种族隔离与歧视，另一面却寻求保持既有特权的新路径和方式（“道德多数派”的崛起就是典型例证，下详）。福音派主导的大觉醒运动的这种两面性，深刻地塑造了美国的传统政治和社会文化。其侧重于民主、自由、平等的一面为左翼或进步主义力量所继承，发展为自由民族主义；而侧重于共和、传统、保守尤其是“基督教特性”的一面为右翼或保守主义力量所承继，最终发展为以福音派为标识的宗教民族主义——福音民族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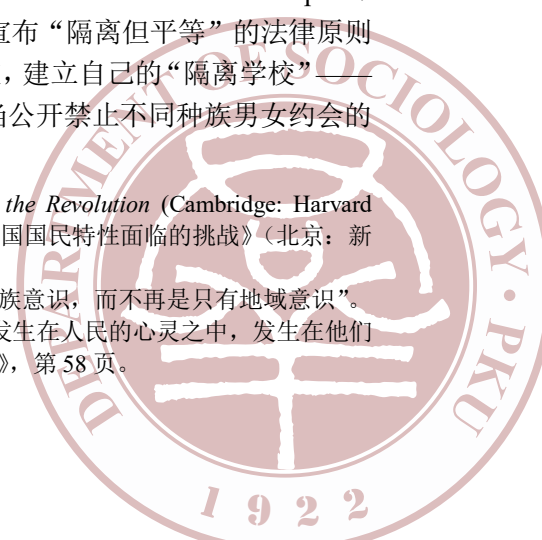
二、“道德多数派”及其政治实践：福音民族主义的一个初步演练

第四次大觉醒运动最终导致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种族隔离被宣布为非法。自此之后，福音派及其他基督教保守群体开始以宗教保守主义的形式追求传统的白人优越主义，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是：195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中的裁决结束了美国黑人白人不同（公立）校的种族隔离制度，宣布“隔离但平等”的法律原则违宪。从此，那些不愿意与黑人同校的南方白人纷纷逃离公立学校，建立自己的“隔离学校”——白人私立学校，这些学校往往以宗教学校的名义享受免税待遇。当公开禁止不同种族男女约会的

¹ Alan Heimert, *Religion and American Mind: From the Great Awakening to the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14, 19. 转引自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第57页。

² 亨廷顿认为，大觉醒使得“美利坚人第一次联合起来，开始形成美利坚民族意识，而不再是只有地域意识”。他引用约翰·亚当斯1818年的话指出“革命兴起于战争爆发之前。革命发生在人民的心灵之中，发生在他们对待责任与义务的宗教情感的变化之中”。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第58页。

³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第58-59页。



福音派院校鲍勃·琼斯大学（Bob Jones University）遭到美国国家税务局查处，面临失去免税地位之际，一位名叫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的共和党活动家，在种族隔离主义分子、啤酒大亨约瑟夫·库尔斯（Joseph Coors）的赞助下，与南方宗教领袖杰瑞·法维尔（Jerry Falwell）等结成联盟，并成功展开游说，软化国税局的执法立场。从此，一个在宗教及道德观念上强硬、保守而著称的所谓“道德多数派”组织形成。

“道德多数派”是一个以福音派为主干的跨教派的政治组织，于1979年成立。其兴起的时代大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维权运动等造成的所谓传统基督教价值观危机，直接动因则是联邦最高法院的一系列裁决，如允许女性堕胎、禁止公立学校祈祷以及参议院批准旨在推动两性平权的《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 1972）¹等被认为“侵害”了基督教家庭价值观的司法及立法行为。在道德多数派主要领导人法维尔看来，最高法院做出的堕胎合法化裁决比以往任何的裁决对国家带来更大的打击；他还把做出禁止在公立学校祈祷的裁决的九名大法官斥为“白痴”，认为这是在用“不受限的权力向基督徒发动战争并对抗全能的上帝”；而试图使男女完全平权的《平等权利修正案》则将全面颠覆基督教的价值观。²

在诸多挑战基督教价值观的（司法）行为中，最让宗教保守人士尤其是福音派难以容忍的是1973年将堕胎合法化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以下简称“罗伊案”）裁决。对他们来说，将堕胎合法化作为国家法律，不仅是“冒犯性的、野蛮的、粗鲁的”，也是对上帝“宝贵作品”的亵渎，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罗伊案”的裁决使他们中的不少人再也无法保持沉默，并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进入政治领域才可能推翻“罗伊案”裁决。³

但是在进入政治领域问题上，福音派等宗教保守群体面临着很大的障碍：一是长期以来，他们总是给政治贴上肮脏的标签，认为人们应该远离它；二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福音派等宗教保守文化都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动员信众参与政治活动有些不现实；三是美国社会的政教分离传统构成阻止福音派等宗教保守群体参与公开政治活动的“天然防火墙”。然而面对美国社会和道德日益衰落、堕落，以及对上帝的公开背离，法维尔等宗教保守领袖决心改变不参与政治甚至厌恶参与政治的传统，团结带领信众用实际行动夺回“上帝或基督教的美国”。法维尔们开启了福音派公开政治化的新里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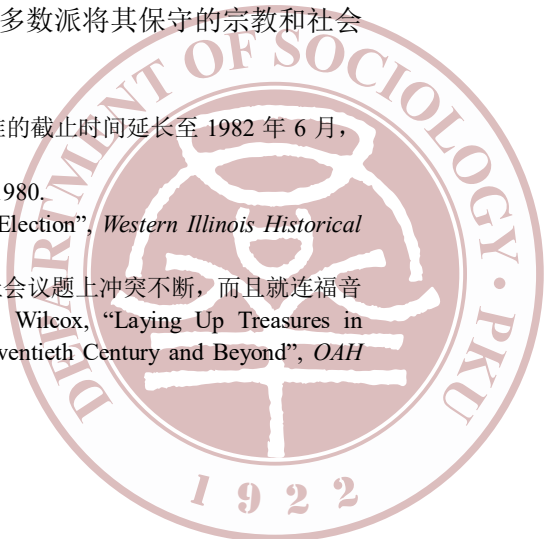
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道德多数派搁置教派争议和分歧，主动吸收基督教、摩门教、天主教乃至犹太教群体中的保守分子（其领导层除了福音派的法维尔以外，还有天主教徒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和犹太人霍华德·菲利普斯（Howard Phillips）⁴，将他们凝聚在反堕胎合法化、女权主义、同性恋及《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旗帜下。为了争取非宗教选民、社会保守派及一般社会公众的支持，道德多数派精心设置议题、打造话语体系。在一些情况下，他们将反堕胎、反同性恋以及反《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措辞巧妙置换为“支持家庭”（*Pro-family*）或“救救家庭”（*Save Family*），号召人们为“保护家庭”而斗争。法维尔认为，这种在政府议程中促进“积极的家庭价值观的愿望”不应被视为“神权政治”，也不应该仅仅被看成是一个宗教议程，它是一种合理的社会的和道德要求。在另一些情况下，道德多数派将其保守的宗教和社会

¹ 参议院批准后，该法案还需提交给各州立法机构在七年内批准——后来批准的截止时间延长至1982年6月，但是直到2020年该法案才得到38个州必要多数批准。

² Eileen Oginitz, “Evangelicals Seek Political Clout”, *Chicago Tribune*, 3 January 1980.

³ Doug Banwart, Jerry Falwell, “The Rise of the Moral Majority, and the 1980 Election”, *Western Illinois Historical Review*, vol. V (Spring 2013). 133-57.

⁴ 在此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不仅基督徒与天主教教徒在政治及许多宗教、社会议题上冲突不断，而且就连福音派自身都分裂成相互怀有敌意的基要派、五旬节派和新福音派等。参见 Wilcox, “Laying Up Treasures in Washington and Heaven: The Christian Right in Evangelical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OAH Magazine of History* 17, (January 2003): 23.



议程装点成政治爱国主义。1976年法维尔利用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举办“我爱美国”的信众集会。在集会上，法维尔表示，尽管美国过去可能有缺陷，但现在已经得到纠正。他向美国政府保证仍然有许多爱国人士爱着这个国家并支持政府和军队的工作。法维尔警告包括福音派及其他宗教保守群体在内的全体选民，“美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上帝的信任和信心”，声称“美国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它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国家”，“如果上帝松开抓着美国的手，那么一切都会结束”。¹

除了上述“统战”策略以外，道德多数派还试图借助于传统（政治）保守主义的议题而与上述群体形成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为此，他们将矛头指向联邦政府的福利计划，认为福利支票是在奖励那些拒绝工作的懒人。法维尔宣称那些制定福利政策的人都是“拒绝按照《圣经》原则生活和工作的世俗人文主义者”，这些人想方设法向努力创业、辛勤工作的新教徒征税，以养活那些无视基督教职业道德和伦理的人²。此外，道德多数派还主张减税、增加国防开支。在对外政策方面，主张持续支持以色列和强力反共，等等。这些主张和诉求具有浓厚的政治保守主义色彩——尽管法维尔坚持认为，道德多数派的主要议题是道德而不是政治。

道德多数派阵营里很快聚集起包括福音派及其他宗教保守派、政治与社会保守派在内的数百万成员。在法维尔的带领下，他们昂首进入政治竞技场。他们迎来的第一场政治较量便是198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大选期间，道德多数派快速动员起来，积极筹款，四处游说信众，鼓励他们进行选民登记。在道德多数派等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里根（Ronald W. Reagan）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卡特（James E. Carter）³。道德多数派成员认为，正是福音派等宗教保守群体发动的强大支持网络才使里根以压倒性优势战胜试图连任的卡特⁴。他们因此有理由相信，里根政府将会在结束堕胎合法化、恢复公立学校祈祷、取消同性恋者的特殊权利、重建男性和女性传统性别角色以及阻止《平等权利修正案》生效等问题上给予回报。一些成员甚至把里根与摩西相提并论，认为他能带领他们“走出不义的荒野”。⁵

里根入主白宫后，道德多数派成员选择“两线作战”，一方面他们直接行动，游说国会议员，试图通过一个名为“生命法案”（Human Life Bill）的宪法修正案（道德多数派奉行的价值理念是“生命始于受孕，胎儿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来推翻“罗伊案”裁决。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旧金山积极行动，企图将同性恋行为入罪化；另一方面，他们通过不同渠道向里根施加压力，希望里根在恢复传统的价值观方面有所作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里根并不想在社会改革领域中挑起争议。上任不久，他就向道德多数派阵营发出了讯号：当务之急是税收和经济领域改革，而不是价值观改革。当然，为了回应在大选期间做出的承诺，里根治下的司法部和财政部于1982年1月撤销了美国国税局取消鲍勃琼斯大学免税地位的决定，但是这一行为遭到迅速而激烈的批评。批评者认为，这是用纳税人的钱来鼓励公开推行种族歧视的鲍勃琼斯大学。为了进一步应对政治上激烈的反对声，里根随后向国会寻求禁止对施行种族歧视的学校免税的立法，此举被认为是对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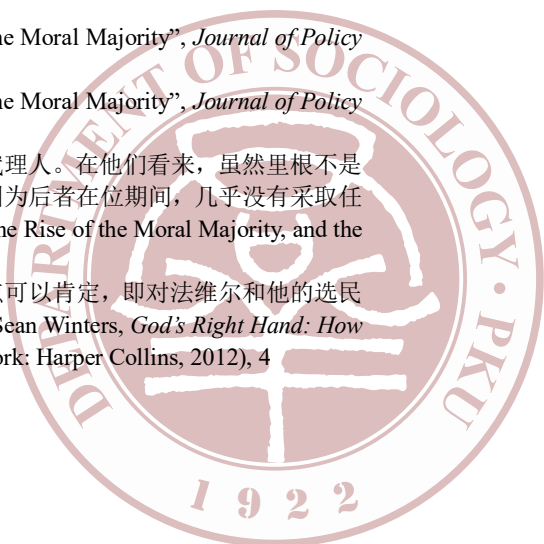
¹ Daniel K. Williams, “Jerry Falwell’s Sunbelt Politics: The Regional Origins of the Moral Majority”, *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 vol.22, no.2 (April 2010): 125-147.

² Daniel K. Williams, “Jerry Falwell’s Sunbelt Politics: The Regional Origins of the Moral Majority”, *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 vol.22, no.2 (April 2010): 125-147.

³ 实际上直到大选前的几个月，福音派等才最终选定罗纳德·里根为他们的代理人。在他们看来，虽然里根不是一个完美的代理人，但他肯定会好于自称“重生派”福音基督徒的卡特，因为后者在位期间，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立法或行政令来抚慰福音派。参见 Doug Banwart, Jerry Falwell, “The Rise of the Moral Majority, and the 1980 Election”, *Western Illinois Historical Review*, vol. V (Spring 2013). 133-57.

⁴ 尽管很难判定道德多数派对里根的成功当选到底起到多大作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对法维尔和他的选民来说，重要的道德问题已成为“里根革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参见 Michael Sean Winters, *God’s Right Hand: How Jerry Falwell Made God a Republican and Baptized the Religious Right*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12), 4

⁵ Bruce Buursma, “A New Crusade”, *Chicago Tribune*, 31 August 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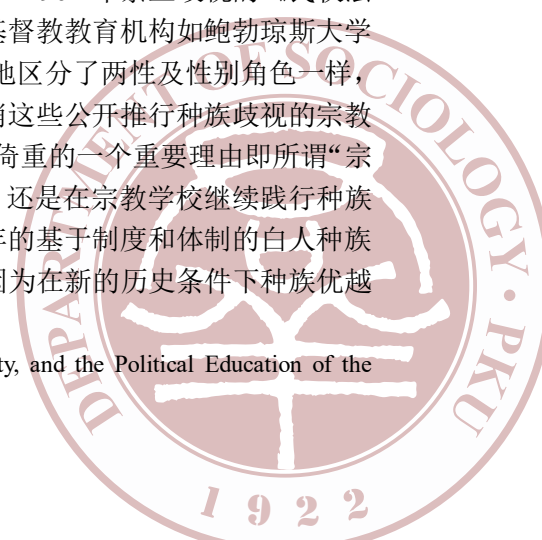
括道德多数派在内的宗教保守势力的一记响亮的耳光¹。不仅如此，里根在任期间，参议院关于反堕胎的两项宪法修正案从未付诸表决；交付表决的关于恢复公立学校祈祷的宪法修正案也因为缺乏足够的票数支持而夭折，显然这一结果与里根消极或置身于事外的态度不无关联。最让道德多数派难以接受的或许是，1981年春里根提名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 O'Connor）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一职，而她曾因支持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和投票支持堕胎权利而遭到许多基督教右翼领袖的批评和责难。

事实上，直到里根卸任，道德多数派所期冀的“社会改革”或“价值观重塑”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从把里根视为摩西到对他的绝对失望，道德多数派深刻地认识到了宗教热忱与政治现实之间的距离。他们深切地感受到政治游戏的规则远比仅凭虔诚和激情的宗教要复杂得多。1989年道德多数派组织解散，里根也结束了总统生涯。

尽管道德多数派仅仅存在了十年，但其带给美国政治和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第一，道德多数派及其运动使以福音派为代表的宗教保守力量公开政治化。在此之前，福音派及其他宗教保守群体往往视政治为“肮脏的游戏”。道德多数派第一次在大选中公开动员基督教选民，并且将政治列为教会的优先议程。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道德多数派在政治上变得异常活跃，他们积极参与选举，支持具有保守倾向的候选人，并制作所谓“不虔敬者”名单，以阻止“不敬上帝者”当选。第二，道德多数派将宗教重新带回公共领域。基督教不仅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议题，而且信教的虔诚度已然成为衡量公共决策合法性的重要基础。第三，道德多数派在堕胎、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等有关基督教家庭价值观问题上所持有的立场，引发了美国左翼、自由派及其他进步主义人群的强烈反弹，使得这一人群更加积极地捍卫自己的观点，这一点为后来愈演愈烈的“文化战争”埋下了隐患（下详）。第四，道德多数派开启的以“宗教权利”追求宗教民族主义（福音民族主义）的政治范例，为美国的政教关系及政党政治的发展添加了新的不确定性因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道德多数派及其运动使得美国传统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矛盾围绕宗教问题开始激化。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以福音派为代表的宗教保守势力选择共和党作为自身利益的代言人，福音派选民从此成为共和党的最大票仓和最坚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共和党也把福音派选民或基督教保守力量作为自己政治活动的重要基础加以培育和利用。所有这一切，对后来美国的政治发展走向及政教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之，道德多数派的出现是美国政治、宗教、社会、文化发展以及种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从表层原因来看，道德多数派的形成是为了应对20世纪50至60年代发生的政治、社会及文化转型所带来的冲击——在福音派等宗教保守群体看来，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年轻人中普遍存在的性道德缺乏，联邦最高法院禁止公立学校的集体祈祷和《圣经》诵读的裁决、堕胎合法的裁决，以及允许学校教授进化论，等等，严重破坏了基督教所倡导的传统道德价值观。但是从深层次原因来看，道德多数派的出现是美国白人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勃兴的一个重要前兆：如前所述，在种族隔离被宣布非法之后，那些不愿意与黑人同校的白人家长便选择成立宗教私立学校作为继续施行种族隔离、践行白人优越地位的场所。在1964年禁止歧视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等系列法案颁行之，一些著名的基督教教育机构如鲍勃琼斯大学仍然顽固地推行种族歧视，该大学公开宣称，正如《圣经》明确地区分了两性及性别角色一样，种族区分也是《圣经》的应有之义。当卡特治下的国税局威胁取消这些公开推行种族歧视的宗教教育机构的免税资格时，引起了这些教育机构的激烈反对，它们所倚重的一个重要理由即所谓“宗教自由”。显然，不论是选择与黑人等有色族裔隔离的宗教学校，还是在宗教学校继续践行种族隔离政策，其深层次的目的都是为了恢复或者维护延续了二百多年的基于制度和体制的白人种族主义。之所以采取宗教的形式或者说以“宗教自由”为名目，是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种族优越

¹ Aaron Haberman, "Into the Wilderness: Ronald Reagan, Bob Jones University, and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Christian Right", *The Historian*, vol. 67, no. 2 (Summer 2005): 234-253.



论难以为继。

种种迹象表明，20世纪70至80年代兴起的道德多数派是21世纪福音民族主义的一种重要的演练或尝试。但是，由于1960年代以来左翼与进步主义运动的巨大影响，加之美国面临棘手的经济问题，特别是由于全球化和另类全球化所带来的贫富分化、身份政治和难民危机等问题还远没有显示出其效应，福音派等宗教保守群体所倾力推动的福音主义并没有产生他们所期冀的结果。从美国政党政治发展的视角来看，当时的共和党与民主党远没有今天分化——这不仅可以从一些民主党议员也支持道德多数派所发起的“支持生命”宪法修正案这一现象看出，更可以从1984年总统大选里根获得95%的选票这一历史事实感知。在政党政治正常运行的历史条件下，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均基本信守着各自传统的价值取向——即便是有所调整或改变，双方均不会严重背离其一贯的价值原则——这也是为什么道德多数派试图将共和党及里根总统框定为其价值观代理人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

当政治保守主义的主流——共和党拒绝成为福音派等宗教保守群体的代理人时，所谓福音主义只能停留在民间层面，成为一部分政客和宗教信众的梦想。当然这并不是说，道德多数派时期的共和党及其总统里根在对待福音派等宗教保守群体的诉求问题上严守中立。事实上，迫于经济议题、多样化的选民、民主党控制着参议院以及左翼与进步主义势力的压力，里根在有意忽略道德多数派关于重建国家道德诉求的同时，任命了大量的保守主义联邦法官，这些大法官加上里根本人对基督教家庭价值观的一贯支持，对后来宗教保守主义的崛起乃至福音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这也是为什么自里根时代以来，以福音派为代表的保守选民始终把三分之二的选票贡献给共和党的重要原因。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道德多数派奠定了共和党与福音派联盟的历史基础。在此后数十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和党与福音基督徒保守势力在政治及价值观上共进共退，共和党利用政治舞台“守卫”甚至提升福音派的价值观，福音派则给予共和党坚定的票仓支持，直到双方完全合流为福音民族主义。

三、特朗普当选：福音民族主义正式形成

21世纪以来，世界及美国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使得道德多数派当年所追逐的福音主义理想在各个层面上都有了实现的条件。首先，从全球角度来看，随着宗教复兴运动不断深入，各种形式的宗教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勃兴，这给福音民族主义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和示范；其次，从美国国内来看，随着新自由主义、世俗化、全球化以及资本主义、物质主义、科技主义和“新历史虚无主义”¹的叠加性影响，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活陷入一片混乱：贫富分化、种族冲突、精英分化、民粹肆虐、政府威信受损、家庭、婚姻不受重视、传统的道德和宗教共同体对社会的影响和塑造力下降，等等。其中情况最为严重的是价值观撕裂或所谓“文化战争”和贫富分化。

从价值观撕裂或“文化战争”的视角来看，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权革命的推进以及少数族裔在经济、社会领域实现相当程度的平等权，美国的左翼及进步主义阵营逐渐从传统的以改善包括少数族裔及白人下层的经济、社会状况为使命转向文化领域，尤以倡导少数族裔、女性及同性恋群体的“文化平等权”为己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数十年来，不仅包括黑人在内的美国少数族群文化在现实中得到追捧，而且在新美国革命史学（New Historiograph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的框架下，美国的黑人、印第安人及其他少数群体获得了美国建国史的“追溯性承

¹ 最为典型的是“黑命亦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中的极端左翼，他们超越时空地引证“自由”、“平等”理念，大肆诋毁建国先辈、破坏雕像、碑文等历史符号，非历史地看待和评价美国的历史人物和传统文化符号，严重地动摇了美国的国基。笔者将其称为“新历史虚无主义”。



认”¹。与此同时，女性的堕胎权和同性恋群体的平等权获得了极大改善，后者还获得了结婚的平等权利。此外，这一时期也是移民政策较为宽松的历史时期。这一切变化在福音派等宗教保守群体看来，严重损害了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和美国国家特性。从贫富分化的角度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凯歌挺进的经济全球化导致美国大量制造业外迁，严重威胁到受教育程度较低、劳动技能相对单一的白人下中层群体的生存和生活。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社会衰退已经蔓延至白人工人阶级。与此同时，农民也因高企的遗产税及环境保护立法而陷入困境。

再次，在上述各种矛盾和冲突的重重压力下，2015年以来，美国保守主义发生明显转向。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为福音民族主义的形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美国保守主义是一个杂糅了各种意识形态和观念的复合物，其中自由至上主义和传统主义是两个结构性的组成部分，它们分别简称为“自由派”和“美德派”。在二战后的大部分历史时期，美国主流保守主义者在民族主义者面前基本保持着定力：冷战结束后，保守主义阵营中的一些传统主义者率先提出“美国优先”议程，但这种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议程没能影响保守主义主流派。然而，随着美国国内外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至少自2015年以来，美国保守主义建制派开始受到“新民族主义”（Neo-nationalism）或所谓“爱国主义”的有力挑战。以特朗普主义（Trumpism）为标识的新民族主义者，将斗争的矛盾同时对准传统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建制派。他们批评保守主义建制派：对内，放任民主党政府“无限制的”多元文化主义，冲击英语地位、美国传统历史史观和学校教育；在移民融入问题上，放松美国统一性标准，导致大量移民族群如拉丁裔、亚裔等难以融入；在同性恋及堕胎问题上，全面放弃基督教价值观，导致作为美国社会根基的家庭风雨飘零。对外，频繁发动战争，输出价值观，导致大量失败国家（failed state）的难民涌入美国，给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造成严重损失和威胁。新民族主义者还批评保守主义建制派长期故步自封，坚守已经过时的“政治正确”价值观。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民族主义者对保守主义建制派大加批评的同时，保守主义阵营内部也发出了呼应“积极的民族主义”的声音。保守主义建制派机关刊物《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主张接纳一种切合实际的、稳健的民族主义。其中两位编辑兼专栏作家里奇·劳瑞（Rich Lowry）和拉梅希·彭努鲁（Ramesh Ponnuru）指出：“民族主义可以是一种健康的建设性力量。由于民族主义情绪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和持久力，所以明智的办法是培育某种类型的民族主义，而不是试图超越它”。当然，保守主义者也强调，这种民族主义不是基于“种族血统”的排斥性的民族主义，更不是那种痴迷于“鲜血和土地”的民族主义，而是基于宪政价值的“爱国的民族主义”。劳瑞和彭努鲁的结论是：美国保守主义既要承认民族主义，同时又要规制、驯化民族主义；“既要支持心胸开阔的民族主义，又要考虑美国的理想，理性算计经济和外交政策的得失”，明智而又温和的民族主义是美国保守主义的理性选择²。他们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保守主义阵营在面对新民族主义挑战时的态度。如此，经过保守主义者的重新阐述，新民族主义顺势成为保守主义联盟中的一员。

面对剧烈的社会改革和变迁，特别是面对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化的历史机遇，以福音派为代表的宗教保守势力，像历史上每次政治和社会转型时期一样，不失时机地跃上美国的政治和社会舞台。福音派在延续道德多数派“政治化”路线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在美国打一场“激烈而持久的文化战争”³。政治上他们的主要手段是“使福音派新教徒进入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使他们加入到共和党阵营”、“把保守派人士选进政府部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较量中，福音派等

¹ Gary B. Nash, *The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Unruly Birth of Democracy and the Struggle to Create America* (New York: Viking, 2005), 28; xxviii.

² Rich Lowry and Ramesh Ponnuru, “For the Love of Country”, *National Review*, 6 February 2017.

www.nationalreview.com/2021/02/nationalism-conservatism-are-compatible-trump-imperfect-vessel/. 转自自万吉庆：《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新动向：民族主义的兴起》，《中华读书报》，2020年4月1日，第9版。

³ 周濂：“‘另类右翼’与美国政治”，《读书》2018年第1期，第23页。



宗教保守力量的关注点已不仅仅限于振兴基督教，而是着眼于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事务进行全面的特性改造，最终使美国回归基督教或重新回到上帝怀抱。因此，福音派阵营并不满足于保守主义建制派提出的“积极的民族主义”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成分极为复杂的、高度政治化的宗教与社会保守群体，福音派阵营在具体的奋斗目标上存在很大差异：绝大部分成员的目标在于恢复基督教文化在美国的统治或主导地位，包括以国家法律宣示基督教的特殊地位、在公共场所树立基督教的标识、以及国家资助教会学校及其他相关机构等，其中约有五分之一的人，追求一种将美国身份与极端保守的基督教融合在一起的政治神学¹。此外，亨廷顿“盎格鲁-基督教文化”的信奉者则侧重于追逐文化和价值观意义上的基督教美国。上述群体的共同点在于，他们一般并不公开声称要建立一个白人基督教国家，但当描述基督教美国的理想图景时，往往暴露出“基督教白人民族主义” (White Christian nationalism, WCN) 的叙事逻辑²。在这方面，事实上亨廷顿也难以例外³。相形之下，“另类右翼”关于美国国家特性或认同的追求则要明确得多，他们直接将美国界定为一个“白人国家”，认为恢复或重建美国国家特性就是要“找回白人美国”⁴。

在2016年那场被认为是“争夺国家发展方向或定义国家特性和认同”的总统大选中，福音派在民族主义化的共和党人支持下，联合了美国社会的各种宗教和文化保守力量、白人优越论者，以及因全球化及国内政策而利益受损的蓝领工人、农民等群体，成功将自称为“民族主义者”的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在那场选举中，福音派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率达到了令人震惊的81%。为了回报这一群体的热忱支持和民族主义化的共和党支持者，入主白宫后的特朗普全面践行福音民族主义：吸纳多名福音派倾向的基督徒及天主教徒担任内阁要职（如副总统彭斯 [Michael R. Pence]；国务卿蓬佩奥 [Michael R. Pompeo]、司法部长巴尔 [William P. Barr]）；颁布“保护宗教自由”的总统令，为教会和其他宗教团体参与政治活动松绑⁵；将“圣经学习班”引进白宫；在做出重要决策时，密切咨询福音派领袖的意见；先后任命三名保守派大法官，以守护基督教价值观；在白宫宴请百名福音派领袖及其家属，彰显白宫与福音派“一家亲”，等等。特朗普任期届满时，前述福音派领袖葛培理的儿子葛福林（Franklin Graham）深情地赞誉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⁶。

“保护宗教自由”总统令颁行后，特朗普以“宗教自由”为抓手，出台了一系列钳制女权、堕胎和同性恋权利的法律和行政命令，使福音派等宗教保守群体欢欣鼓舞。白宫“圣经学习班”的领班牧师拉尔斐·德罗林格（Ralph Drollinger）宣称“我所有基于《圣经》研究的政策建议和政治主张，都在特朗普那里实现了”⁷。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加紧对移民的管控，明确立法禁止

¹ Andrew Whitehead and Samuel Perry, “The Growing Anti-Democratic Threat of Christian Nationalism in the U.S.,” <https://time.com/6052051/anti-democratic-threat-christian-nationalism/>.

² 一个比较流行的版本是：美国是由（白人）基督徒（定居者）建立的一个基督教国家；其法律和制度以《圣经》为基础。美国是一个领有天命的国家，其巨大的财富和权力来源于上帝。美国同时被赋予了一项使命：传播宗教、自由和文明——必要时通过武力传播。但是随着非白人、非基督徒和非美国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美国土地上，这一使命受到了威胁。因此，白人基督徒必须“夺回自己的国家”。参见 Philip Gorski, “White Christian Nationalism: The Deep Story Behind the Capitol Insurrection”, *Berkley Forum* (22 January 2021), <https://berkeleycenter.georgetown.edu/responses/white-christian-nationalism-the-deep-story-behind-the-capitol-insurrection>, 12 October 2021 retrie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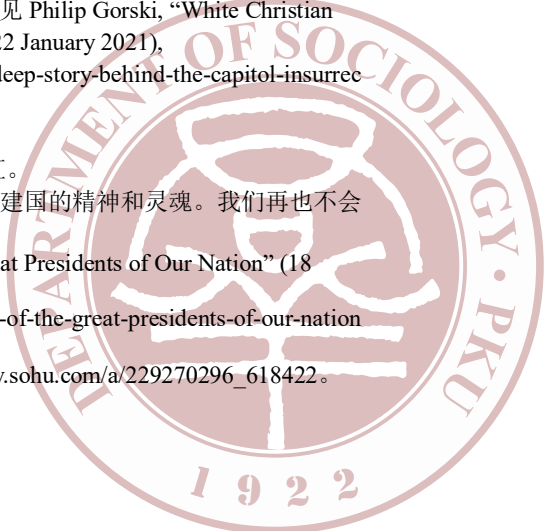
³ 亨廷顿关于“定居者”的叙事与 WCN 异曲同工。

⁴ 必要的时候，他们也借助于“文化”或“基督教”这些具有动员效果的词汇。

⁵ 在总统令签署仪式上，特朗普说，“信仰根植于我们国家的历史，它是美国建国的精神和灵魂。我们再也不会允许信仰群体被针对、被欺凌和被禁声的现象出现”。

⁶ John Carter, “Franklin Graham: History Will Remember Trump as One of the Great Presidents of Our Nation” (18 December 2020), www.kwtx.com/2020/12/17/franlin-graham-history-will-remember-trump-as-one-of-the-great-presidents-of-our-nation/.

⁷ 周少青，《白宫出现“圣经学习班”》（2018年4月24日），搜狐新闻网www.sohu.com/a/229270296_618422。



特定国家的移民入境，并在美墨边境修筑隔离墙。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受到以白人至上主义为底色的本土主义势力的热情赞誉。

对外，特朗普政府公开奉行“美国优先”战略，并不惜以孤立主义、干涉主义和本土主义等相互冲突的政策和理念为之开道。作为一名被福音派等保守群体抬进白宫的总统，特朗普可谓不负众望。通过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理念，以及基督教保守观念的政治宣示和一定程度的国家动员，美国福音派等保守主义由一种宗教保守力量，发展成完整形态的民族主义——福音民族主义。福音民族主义是美国国家（民族）主义在21世纪的新表现。

四、福音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

福音民族主义的崛起是美国民族国家发展史及国家治理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美国自二战以来形成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相互缠斗、相互支撑的传统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那么，福音民族主义究竟是一个插曲式、过渡性的现象？还是一个从此改变美国政治图景的方向性现象？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需要回到其缘起的几个重要条件或历史背景中。

第一，福音民族主义是应对外部条件巨变的产物。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共振，美国陷入内外多重困境。在国内，由于贫富分化加剧，中低层人群的生存状况持续恶化（美国甚至沦为“最不平等发达国家”）。与此同时，由于种族或族群矛盾叠加“文化战争”，国内政治极化严重。国际上，由于长期强力推行西方价值观且效果不佳，加之中国、印度等经济体的迅速崛起，美国的国家声誉、国际影响力或国际地位相对下降。在民主与共和两党传统的政策和意识形态无法做出有效应对的历史条件下，混合了保守主义和福音主义要素的福音民族主义走向了历史前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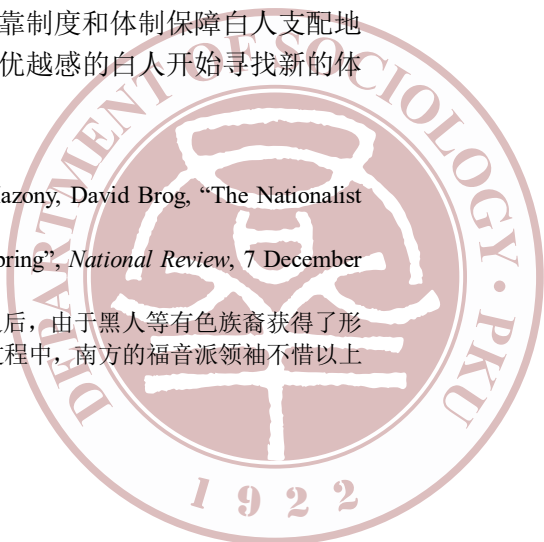
第二，福音民族主义是美国传统保守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衍生物，具有强烈的策略性和应对现实性。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美国的保守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不断随历史和社会发展而做出调整。有着“新保守主义教父”之称的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曾提出“民族主义是保守主义的三大核心支柱之一”¹。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形势发展使一部分保守主义者认为，有必要适度引进民族主义以矫正和平衡政治和社会生态的失衡。特朗普当选后，以色列圣经学者约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和亲以色列的保守主义者大卫·布罗格（David Brog）一致欢呼“保守主义的新生”，他们认为不论是从知识体系还是从政治传统来看，新一轮的保守主义运动正在开启；他们还强调“民族主义不是对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背叛，而是回归”²。与此同时，保守主义建制派也积极重新阐释民族主义，以适应保守主义面对的新现实。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宗教保守派来说，福音民族主义是一种本质性回归；而对保守主义建制派来说，福音民族主义则是一种策略性的保守主义。

第三，从更为久远的历史背景看，福音民族主义也是传统的白人种族主义借基督教的盛装在新时期的一次亮相。众所周知，美国有着深重的种族压迫、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历史。直到195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种族隔离违宪之前，美国一直都是一个依靠制度和体制保障白人支配地位的国家³。在种族隔离被宣布为非法之后，那些依旧沉湎于种族优越感的白人开始寻找新的体

¹ 克里斯托提出的另外两个支柱分别是宗教（基督教）和经济增长。Yoram Hazony, David Brog, “The Nationalist Spirit of 2016: A Conservative Spring”, *National Review*, 7 December 2016.

² Yoram Hazony, David Brog, “The Nationalist Spirit of 2016: A Conservative Spring”, *National Review*, 7 December 2016.

³ 内战之前，白人不论是在制度上，还是体制上都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内战之后，由于黑人等有色族裔获得了形式上的公民权，白人转而通过吉姆·克劳法来延续自己的种族特权。在此过程中，南方的福音派领袖不惜以上帝或圣经信条来为这种系统的种族隔离提供合法性论证。



制或制度依托，而基督教及宪法保障下的“宗教自由”成为一个极为理想的替代品¹。可以说，尽管在纯粹的宗教意义上，包括福音派在内的基督教是一个绝对超越种族或族裔边界的普适性宗教，但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深受特朗普主义影响的当下，福音主义或者福音民族主义都是白人种族主义者或白人优越论者的重要栖息场所或载体。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当选总统的第二天，包括许多福音派在内右翼人士欢呼“特朗普带来的民族主义”，并认为“这是美国白人的胜利”²。

第四，从公民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两分的视角来看，任何迄今为止配得上“现代国家”称呼的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公民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两种价值取向。在国家处于进步或上升时期时，其公民民族主义的色彩往往相对鲜明，反之则族裔民族主义氛围相对浓厚。美国也是如此。由于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因此缺乏西欧民族国家那种传统的、连续性的族裔基础。当国家处于进步或上升时期，其公民民族主义的一面表现得比较明显（至少是在法律文本层面）；当国家相对下行又或处于危机或挫折时，族裔民族主义的一面就开始显现——由于历史的、宗教（文化）的及政治（特别是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表达美国族裔民族主义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在了以福音派为代表的宗教保守群体身上。这也是为什么《把美国还给上帝：美国的基督教民族主义》(*Taking America Back for God: Christian 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的作者安德鲁·怀特海德(Andrew Whitehead)和塞缪尔·佩里(Samuel Perry)把基督教白人民族主义同时称作“族裔基督教主义”(ethnic Christianism)的重要原因之一³。

第五，从现代性视角来看，福音民族主义的登台也是美国现代性危机的一次预演。第一次大觉醒所宣扬的对上帝虔敬前提下的个人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和理性主义破除了僵化的、体制化基督教藩篱，为美国的破土而出及其后两百多年的巨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此过程中，获得解放和个性伸展的新教徒并不总是按照上帝所赋予的“理性”去思考、行动和认知基督教，而是日益走上了世俗主义、怀疑主义、不可知论甚至无神论(据调查，全美约有三分之一的受调查者表示他们“没有宗教信仰”)，与此同时，美国社会生活中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绝对自由、平等主义之风日益蔓延——同性恋平权直至同性恋婚姻完全合法化、女权主义乃至堕胎完全自由以及传统家庭伦理和价值观的蜕变，加上以丧失生活的方向感、价值感和意义感为标识的颓废主义的兴起，等等，导致几乎占总人口一半的福音派及其他基督教保守群体、天主教徒、犹太教徒甚至伊斯兰教徒中保守群体的强烈不满。这一切再叠加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认同问题，没有宗教信仰的普罗大众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正在遭受的危机。

正是在上述历史条件下，福音派走到了历史前台。尽管这一时期的福音派不再是历史上那个引领主流政治社会文化、时刻矫正国家方向、充满着世俗主义精神的宗教，但它仍然代表了“基督教美国”的传统属性，代表了美国文化乃至整个西方文化“属灵的内在”。如论者所言，福音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反映的是美国乃至西方文化所面临的一场生存危机”，“它最深刻的地方是期待一场灵魂救赎，从而将西方从物质主义和科技主义的精神荒漠中拯救出来，从资本主义的平庸生活中拯救出来，从历史终结的‘末人’世代中拯救出来”⁴。在这个意义上，福音民族主义的兴起具有“美国精神救赎”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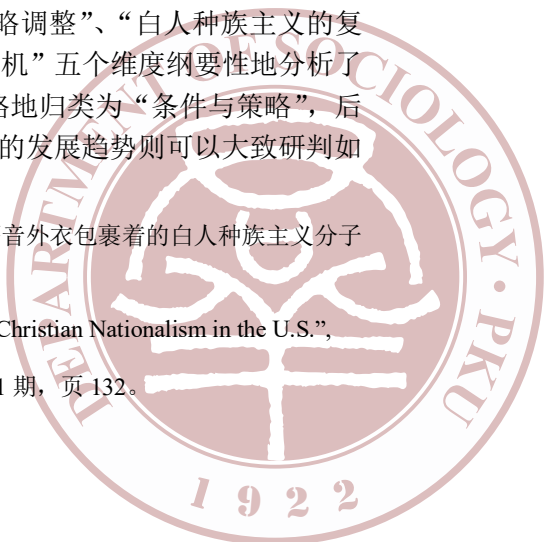
以上笔者从“应对美国内外部条件巨变”、“传统保守主义策略调整”、“白人种族主义的复兴”、“公民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的互搏”以及“美国现代性危机”五个维度概要性地分析了福音民族主义崛起的条件或历史背景。如果可以把前两个维度粗略地归类为“条件与策略”，后三个维度大致划归为“认同与终极信仰”的话，那么福音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则可以大致研判如

¹ 在2016年竞选期间及随后特朗普的执政过程中，“宗教自由”成为那些用福音外衣包裹着的白人种族主义分子非常称心、得力的工具话语。

² 周濂：“‘另类右翼’与美国政治”，《读书》2018年第1期，第20页。

³ Andrew Whitehead and Samuel Perry, “The Growing Anti-Democratic Threat of Christian Nationalism in the U.S.”, <https://time.com/6052051/anti-democratic-threat-christian-nationalism/>.

⁴ 孔元：“美国当代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1期，页132。



下：一方面，随着美国面临的内外矛盾的相对缓和及保守主义策略的相应调整，特别是随着公民民族主义阵营力量的增强，福音民族主义的动能将进一步减弱（2020年总统大选中特朗普的败选是标志之一）。另一方面，从“认同与终极信仰”的视角来看，尽管随着美国内外部条件的舒缓，以“文化战争”为表征的认同问题会相对纾解，但作为一个以基督教文化与信仰支撑的“基督教国家”，福音民族主义仍将具备十足韧性。在可见的未来，尽管福音民族主义的“领头羊”福音派面临着人口下降（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年轻人的退出）、内部冲突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但它作为美国基督教社会的中枢和传统价值的积极捍卫者，仍将是福音民族主义的中坚和旗手。福音民族主义也将继续在美国内政和外交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网络文章】

南方境外：强进与退让¹

——对中国与东南亚间国际关系的文化史思考

王赓武²

一、引言

可能是因为我最近感到年纪大了的缘故，反思了很多过去的事情。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长在马来西亚，当时是英属马来半岛，里面有不同的王国。我长大的地方叫霹雳洲，当时是叫霹雳王国，王国信奉的宗教是伊斯兰教，霹雳王国里华人的数量大约占到三分之一。我出生的地方叫怡保，是一个华人的聚居区，多数人来自中国的华南，主要是客家人，当地的生计方式是开采锡矿，锡矿的发展特别成功。我中学毕业之后，到南京中央大学（即今天的南京大学）去念书。当我上到二年级的时候，由于国共第二次内战打到了长江，南京的学校因为担心战火而关闭，我就回到了马来。马来在二战之后，随着英国势力的渐渐退出，成为马来亚联合邦。联合邦一共九个小王国，再加上檳城和马六甲，就成为马来亚联邦。本来新加坡是属于这一个系统的，曾经都是英国人管理的殖民地，但是英国人跟马来方面谈判的时候，因为顾及到新加坡的华人太多，加入后会使得非马来族群人数超过国民人数半数，马来方面不希望新加坡加入到马来亚联邦。因此后来马来方面就跟新加坡分开了，但是我回到马来来的时候情况还没有那么清楚，因此我重新上的大学是在新加坡建的马来亚大学，是现在国立新加坡大学的前身。结束在那里的深造之后，接着到英国继续学业。

我想回述这段历史，一个主要原因是每当我想起那段时期，总会有一个感觉，跟今天的题目有些关系。各方面不同的政体，不同的历史经验，每个人都会有所经历。比如像我，出生的地方

¹ 本文为王赓武先生2014年11月8日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秋林报告厅所作讲座整理稿。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联合承办，得到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资助。承蒙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卞恒沁同学提供讲座速记稿，王钊同学提供现场录音，特此一并致谢。
https://mp.weixin.qq.com/s/oJAzcfT_nBWCPUUzmqFOeg (2021-12-11)

² 王赓武先生祖籍河北正定，1930年出生于荷属东印度（今印尼）泗水。1955年获马来亚大学（今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学位。1957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57年起先后任马来亚大学历史系讲师、教授兼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68年起任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系主任与太平洋研究院院长。1986年至1995年期间担任香港大学校长。1994年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目前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王赓武先生于2007年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第三位任命为大学教授的学者。为研究现代中国史、国族主义、海外华人、华人移民的权威历史学家与教育家。

